



# “改革”与“反思”的复归

□冯 帅

2009年，作家阿耐的小说《大江东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为第一部荣获中宣部“五个工程”奖的网络小说。2019年，《大江东去》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成为新中国“文学描写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以改革开放20年为时间线索，以主人公宋运辉为轴心，通过姻亲关系、邻里关系织就一张辐射广阔的社会关系网，在对宋运辉、雷东宝、杨巡、梁思申人生际遇进行书写的基础上，透视国营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商投资经济等的发展变迁，大笔描绘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程。小说采用了编年式的结构，每一章节都用年份命名，四位主人公在发展经济道路上各自的悲欢离合全被容纳其中。

随着时代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改革小说”和“反思小说”渐渐归于沉寂，但是有关于历史的记忆长久地留在不少作家的经验之中，也包括阿耐。阿耐曾用“不要让我们最近的历史成为盲点”来概括她写作《大江东去》的初心，她有意识地让小说承担“文学介入社会”“文学介入人生”的文学使命，小说出版时也打出了“改革开放30年记忆之书”的口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四个现代化建设、国企改革、所有制改革、外资涌入、下岗工人问题、南巡讲话、香港回归、亚洲金融危机等政治经济事件构成了情节推动的主要节点，人物的命运发展与社会公共事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物的性格冲动和心理动线退居二位。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宋运辉因为受制于家庭出身而不能考取高中，因此和父亲发生激烈的争吵，父亲险些因此而丧命，若不是因为高考的恢复，即便内心怀揣着再多对读书和出人头的渴望，宋运辉也难以走出南方那重峦叠嶂的小山村；没有经济所有制的改革，雷东宝也无法在小雷家确立威信，杨巡只能于蒸馒头一途上下功夫。

社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成为推动小说前进的内在驱动力。通过重申我们触手可及的历史，抽丝剥茧式地处理“改革”的热忱和“反思”的痛楚二者紧密缠绕的关系，《大江东去》成功地实现了“改革小说”与“反思小说”的一次双重回归。

小说中的四位主人公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他们的困境。宋运辉初到金州总厂，就不得不直面书记和费厂长相互倾轧的职场政治、国营企业庞大但缓慢的身躯、厂内职工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以及普通工人朝生暮死的生活疾患。在小雷家村凭着一腔孤勇推行改革的雷东宝需要面对的是村民自下而上的凝视，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监管，农村集体企业改革的深水区的政策盲点，犹豫监管不力致富带头人竟监守自盗。作为一个个体户摸爬滚打的杨巡则是在重资源壁垒和产权重难渡的社会成见下艰难前行，

“杨小倒爷”的身份让他受尽白眼，于是不得不一次次选择通过经营星级酒店、高级商场的方式来获得自我价值的确证。即便是看似无所不能的外资代表梁思申，也难以逃脱理想主义的水土不服。

除了解决固有的沉痾，他们还要应对新产生的种种问题。在刚刚调转头、蓬勃发展、充满希望的的土地上，许多事情正被突如其来的经济利益所裹挟和扭曲，改革者们并没有选择与之共沉沦，而是或隐或显地捕捉到迅速发展背后伴生的危机，迎难而上。这些困境引发不同年龄读者产生同样的共鸣，时代虽然改变，但是横亘在青年成长道路上的核心困境仍然相似，活在当下的年轻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仍旧或多或少拘困在上述困境里。这时《大江东去》似乎变成了一本生活职场启示录，四位主人公在自我修炼中逐渐成长为改革英雄，教导重拾锐意进取的精神。

作者自陈她的写作始终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四位主人公确乎用理想烛照着他们的改革实践。于宋运辉，他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面对同辈人虞山脚的经济引诱，始终把守着内心的底线，用近乎严苛的高道德标准约束着自己，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展现出了一代国企领导人的使命与担当。杨巡身上则是充斥着“个体户”能吃苦、能拼搏、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他总是在恰当的时机抓住一切机会壮大自己的力量，即便摔了跟头，也能擦去脸上的血与汗，重新向前。

在理想主义似乎渐趋褪色的年代，改革者们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胆识为当代读者的心中注入一股暖流。与此同时，也为青年读者提供了进入生命既新且旧的方式，那就是用理想观照现实，理解现实，重构现实，用生命蓬勃的激情冲刷生长道路上可能遇到的礁石，在时代澎湃激流的指引下逐浪前行。

《大江东去》并不仅仅止步于用想象弥合现实的错位，用大而无当的口号掩盖发展历程中的矛盾，那些理想旁落、旧的价值体系愈发混乱的瞬间都被小说囊括其中。作者埋下的是“反思”的种子，她笔锋犀利，通过人物命运的浮沉传达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

小说中雷东宝的结局最意味深长。雷东宝似乎带有充满原始激情的理想主义，他敢想敢干，豪气冲天，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接下老村长的任命，在创业初期公而忘私地带领小雷家村发家致富，一心扑在事业上，小雷家也成为当地的致富典型。在其他经济体尚在改革的边缘试探之时，农村经济自发的改革已经一马当先，雷东宝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小雷家发展的过程中，雷东宝的性格也不断异化，他的身边缺乏像梁思申、任遐逝式的制约人物，在正



明、红伟等人对其神化和吹捧之下，雷东宝渐渐忘乎所以，他希望自己是小雷家唯一的英雄，“他就是小雷家，小雷家就是他”。越来越膨胀的个人私欲压倒了雷东宝心中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在他入狱以后，他迫不及待地在他小雷家重振威风，用越来越高级的名车和私人用品粉饰越来越虚弱的自我，最终走向他最初出发点的反面，成为强弩之末，在他服务了半生的群众面前轰然倒塌。

小说最后希望完成的，实际上是反过来用驳杂的现实景观完成对最初理想的拷问。正如阿耐在书中写道：“我有幸生活、成长在这个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年代。我和我的同龄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也被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欲望驱使着，全身心地投入大家小家的建设，我们取得骄人成绩。但是驻足回望，却是看到很多盲目，很多不足，很多遗憾。我们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我经历过，我正思考。我需要写出来，先给自己一个回答。”

《大江东去》从解决时代问题入手，落于挖掘出被表面社会问题遮蔽的历史的永恒。浪潮式的文学史观恰是小说重建个人与历史有效关联的桥梁，在泥沙俱下的现实中，既要心怀崇高，也不避讳低劣。当代中国的社会改革恰如声势浩大、迅猛奔腾的洪流，其中有人“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与压潮头”，也有人在勇立潮头之后，被大浪所淘洗成为沉渣，人们不能只看到大江大河，而忽略大江大河之下那些不为人知的水滴石穿。这大概就是作者最希望说明的问题。

## ■关注

读小学的时候，我从老师口中知道了杨靖宇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故事。读中学的时候，知道了杨靖宇将军是河南人，老家确山离我们南阳邓县并不远。当兵之后学习他的事迹，方知道他牺牲后，日本人在他的胃里发现的全是树皮和棉絮。对杨靖宇的尊敬早就在心里，但说实话，将他35岁的人生生动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是在读了张新科的长篇小说《山河传》（河南文艺出版社）之后。

以真实的人物为小说主角，与虚构人物相比，有更大的难度。难度在于要先把所写人物的真实生平事迹摸清楚、揣摩透，然后才能动笔。我听说作者为此5次赶赴河南驻马店、确山、开封、上海，3次远赴抚顺、长春、吉林、磐石、通化、靖宇县、哈尔滨等地，采访了50余人，购买有关杨靖宇的书籍100多本。正是因为创作前做了大量的准备，获取了无数的写作素材，在创作中才能充分展开自己的艺术想象，把杨靖宇这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书中很多有关杨靖宇的资料是首次披露，过去，我们只知道杨靖宇将军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知道他是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图腾和文化符号，但实际上对他的个人生活缺少了解，比如他浓烈火热的故乡情结，他好学上进的青葱岁月、他懵懵懂懂的校园时光。书中写到，生活中的杨靖宇勤学好用，嫉恶如仇，写到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地区最早县级农工革命政权中的经历，他在复杂环境下与日伪汉奸的斗智斗勇，他辗转曲折的狱中奇遇以及牺牲前被叛徒出卖的种种细节……这些我们过去了解甚少，如今，通过作者细致的小说笔触，读者可以真切感受这一切。

张新科之所以写这部关于英雄的小说，除了为英雄作传、向英雄致敬之外，我想他的最大用心是向我们展示一条英雄的成长之路，让更多的后人从这条坎坷崎岖的道路得到启示，从而也生出成为英雄的决心。小说由杨靖宇1923年在开封读书的生活开笔，写到他怎样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直至1940年为抗日壮烈牺牲。作者以波澜起伏的故事、充满感染力的语言，全面呈现了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成长过程，真实展现了将军以热血染红白山黑水、以铮铮铁骨赴烈殉国的革命生涯。作者的笔既见事见人又见心，巧妙借助动人的细节展示英雄背后的欢喜与忧愁、青春和梦想、成就与牺牲。读者能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位有血有肉、有温度的英雄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少年学子一步步成长为英雄人物的。

杨靖宇的家乡在河南确山，他原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但他舍下温暖的小家，舍下未竟的学业，怀揣着崇高理想奔赴冰天雪地，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杨靖宇本名马尚德，高大帅气，爱母顾家，但因为革命需要，1929年离开家乡远赴上海，之后“马尚德”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名为张贯一的河南硬汉。1932年，张贯一被捕，刑满释放后，为驱除外辱、平定天下，又改名为杨靖宇。从马尚德到张贯一再到杨靖宇，一位民族英雄完成了凤凰涅槃。杨靖宇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之后，以无比坚韧的毅力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率领东北抗联与日寇长期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下煤窑、走山林、会匪首、拉队伍、夺物资、袭汉奸、战日伪……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杨靖宇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自己身陷重围。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孤身一人与数百名日伪军周旋，直至弹尽粮绝，壮烈殉国，年仅35岁。张新科用小说告诉我们：杨靖宇所以能成为一个英雄，首先是他的心里早有志向，他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下，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其次是他甘愿舍弃小我，奉献民族国家；再就是他胸中深植着中国人的气节，有前辈英雄文天祥那股子死不屈的精神。

有自己的英雄，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尊敬自己的英雄，这个民族就会有灿烂的明天。张新科用自己的笔墨描绘杨靖宇这个人物，是在重塑中华民族的英雄雕像，是在弘扬“丹心已共山河碎，大义长争日月光”的英雄精神，这对于牢固民族精神之根、铸造民族理想之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用文字为英雄塑像

——读长篇小说《山河传》

□周大新



## ■评论

# 是谁碰碎了美丽的爱情

——评程青的《盛宴》 □贺绍俊

程青的《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高档住宅小区，这里居住的基本都是知识精英，他们或是海归，或是企业高管，或是生活专家，或是大学教授，他们精神饱满、生活优雅。程青仿佛十分熟悉这个群体，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他们其乐融融的生活景象。这是一个最具时代特征的群体，他们脸上的表情、身上的装束，以及他们的兴趣爱好，无不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让我们有一种置身其中的强烈现实感。但是程青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她像一位情感的侦探，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揭秘他们的精神困惑，又像是一位心理医师，要诊治现代人在婚姻问题上的心理疾患。因此，这也是一部有着丰富精神内涵的小说。

小说一开始便是一幅琴瑟调和、伉俪情深、动人的画面。主人公黎先生和黎太太在沁芳园里是一对人人艳羡的夫妻，两人当年在美国留学，在异国结下了爱情的果子，在他们的爱情故事里自然包含着太多的真诚、纯粹，比如黎先生的苦苦追求，比如黎先生为了爱情甘愿放弃在美国的高薪职位，陪黎太太回到国内，等等。如今，他们虽然结为夫妻了，却仍像热恋中的情人一般。在沁芳园这个高档小区里，由知识精英组成的幸福家庭自然不少，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分享快乐。程青不吝笔墨地抒写着他们的快乐和自得。最华丽的一场聚会应该是某次情人节在黎先生奢华雅致的豪宅里举办的party，他们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纪念他们的定情时刻。因此，聚会的主要话题也与爱情和婚姻有关。来参加聚会的八对夫妻看上去都有着美满的婚姻，他们在“真心话大冒险”中也坦陈各自的爱情故事。每一个爱情故事都很感人，正是他们的爱情的存在才收获了他们如今的美满婚姻。但是，程青已经早早地埋下了伏笔，她对婚姻之后美好的爱情还能否延续下去心存担忧。她列举了一批文学大师关于婚姻的至理名言，并得出结论，大师们对于婚姻都不乐观。果然，爱情慢慢出了问题，最终的结局是黎先生和黎太太离婚了。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有一句话成为了经典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觉得不妨将这句话理解为一种爱情进行时的时间叙述：幸福家庭是一个过程，幸福之后便是不同

的不幸纷至沓来。而绝大多数作家似乎对幸福不感兴趣，都热衷于书写爱情进行时的后一段，他们在探讨各种不幸是如何发生的。程青也不例外。我感兴趣的是，她是如何来解释这种不幸的。程青的确有着自己独到的解释。程青重点写了黎先生和黎太太的婚变。这场婚变显得那么不可思议，因为黎先生和黎太太在小说中是一对多么令人敬佩的恩爱模范啊。程青恰巧就是要提醒人们，越是恩爱，越可能隐藏着危机，而这种危机是黎太太在恩爱中逐渐把自己忘记了。黎太太曾经对自己的婚姻是多么满意多么自信，享受着相夫育子的乐趣。只有当爱情的小窝崩塌后，她才觉悟到：“在爱情中舍弃自己是个错误，而且是个巨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这应该就是程青对爱情之不幸的诊断。表面上看，黎太太每天活得很开心，但细想想，她的开心都是为了别人而开心，自我完全被压抑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和宋莹莹精神出轨。宋莹莹长期出入他们家，他那不俗的谈吐和绅士的作派无意中开启了黎太太压抑的自我，她不由自主地将爱情转移到了宋莹莹的身上，当她意识到自己情感的错位时又深深地自我谴责。尽管她及时地刹住了车，但她的自我也由此被唤醒，带着自我的眼睛再来审视这个“幸福”的家庭时，她才发现这不是她应有的生活。

不得不承认，程青揭示的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这背后是淡化女性自我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弥漫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就发现我自己也习惯于任这种社会意识左右我的思维，比如我一直将女主人公称为黎太太，却没有想到应该用她自己的名字朱莹莹来称呼她。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太习以为常了，程青在叙述中似乎也刻意为之，她在讲述黎先生和宋莹莹的幸福生活时一直是用“黎太太”的称呼，而到她决定离开沁芳园后，才以“朱莹莹”来称呼她。从这一不显眼的细节也可以看出程青在叙述上的精心。她以一系列看似日常化的细节强化了所要表达的主题：无论在爱情中还是在婚姻中，女性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

程青是一位有着清醒女性意识的作家，但她的女性意识是温暖的。也就是说，她并不是在男女对抗的语境中来彰显自己的女性意识，她很少在小说中将男性作为尖锐的对立



面来烘托自己心仪的女性形象。这样一种女性意识非常微妙，程青对男权文化中心的严峻现实有着自己的认知，她不愿意把责任推卸到一个个体的人身上，而是认为应该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等层面上寻找原因。在程青看来，男人有时候也是男权文化中心的受害者。从程青对黎先生与林小莱婚外情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出，她是把黎先生作为一名受害者来对待的。当他的太太朱莹莹在家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他的爱情对象也就固化了，他们俩的爱情律动也就暂停了。黎先生似乎默默接受了这种安稳的生活。但他的爱情仍然是活跃的，他仍然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只不过因为妻子在家庭生活中压抑了自我，这实际上也就造成了他的爱情失去了宣泄的对象。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一个潇洒不羁的林小莱出现在他眼前时，便轻易地调动起他的兴奋来。当然，黎先生既是受害者，更是施害者，因为他把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看成是一个家庭顺理成章的事情，他纵容了淡化女性自我的文化观念在婚姻中的肆虐。程青尽管在叙述黎先生时对他抱有怜悯和惋惜之情，但她并不原谅他的出轨。因此，最终她也没有让朱莹莹回到黎先生的身边，重修旧爱。程青要借此表达她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强烈呼唤。如果说，朱莹莹在那次与宋莹莹交往的迷思中让自己重新回来的话，丈夫的这一次出轨事件则使得她的自我强大起来，程青写道：“她的笑容里多了自信和通达”。重塑了自我的朱莹莹今后会幸福吗？这似乎就是当年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就让我们暗暗祝福朱莹莹带着强大的自我去寻找自己的爱情吧。

# 扶贫文学创作中的乡土新变

□张堂会

百年以来，从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进程中，乡土社会一直是中国作家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众多思想观念汇聚交织在这个广阔富饶的场域。从鲁迅描写浙东乡村的《故乡》《社戏》《风波》等“满含着中国的土气”的作品开始，到鲁迅的《菊英的出嫁》、蹇先艾的《水葬》、许杰的《赌徒吉顺》、台静农的《烛焰》等一批乡土小说的涌现，再到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平原》、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麦河》等一批成绩斐然的乡土作品，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大宗。扶贫开发带来了农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也带来了新一轮乡土文学的复兴，出现了赵德发的《经山海》、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滕亚甫的《战国红》、李明春的《山盟》、马平的高腔》等众多多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长篇小说。在这新一轮的乡土文学热潮中，周荣池的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是扶贫开发催生出来的一朵美丽浪花，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扶贫文学创作对传统乡土文学的继承与超越，折射出一种新的文学审美观念与文学生产机制。

《李光荣下乡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以青年干部李光荣到美丽乡村担任第一书记为叙事线索，具体讲述了他参与地方扶贫与文化建设的工作经历，同时辅以他和薛小仙、杨树叶之间美好纯真的感情副线，书写扶贫开发背景下古老乡村的美丽蜕变，歌颂了乐善好施的商人谢生林、品行高洁的民间文人钱白平、终身传教的薛阿简以及王俊等时代新人形象。作为第一书记，李光荣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着眼于文化方面的“精准扶贫”。他潜心研究地方民间文化、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掌故，采访书写好故事、寻找挖掘农民精神，歌颂乡土民间团结，抒发新时代的美丽乡愁。在周荣池的书写中，我们感受不到以往乡土作家常有的那种痛苦愤懑的激情与批判启蒙的眼光，其笔下的乡土风情也迥异于上个世纪20年代《水葬》《赌徒吉顺》《菊英的出嫁》《烛焰》《惨雾》等小说中描绘的农村、愚妻、冥婚、冲喜、械斗等奇风异俗。《李光荣下乡记》展示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乡风民俗，特别是带有地域色彩的穆斯林文化。小说详细描绘了清真美食节上美食技艺比赛的情形，展示了清真村的餐饮特色与地方风俗民情。厨师小和子由于以往与“回婆阁”之间的恩怨过节，不愿意参加政府组织的比赛。在二歪子的激法之下，她参加了清真美食节的美食技艺比赛，获得业余民间组第一名的好成绩。“我家在高邮北下河，妹妹家在三里坡，每天我上工从她

门前过，她眼睛总是望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清新秀美的湖光山色中，小说中不时回荡着《高邮西北乡》那样火辣辣的乡野民间小调。李光荣作为第一书记，能够真切地面对新农村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感受到了那些逐步消失的村落和文化传统带来的难以言说的乡愁。他决心要做乡愁的守护者，为地方文化建设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文化方略上呼应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措施。

中国乡土社会涵盖地域广泛，从北国的大兴安岭到南方的云贵高原，从东部的沿海省份到西部三边地区，反映在扶贫文学创作中的风土人情因此也就面貌各异，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一股浓郁的山风海韵。这些作品接续了以往乡土文学创作中的民俗民情，细腻地描绘了苏北里下河特征的地域风情，都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李光荣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打量这些乡风民俗，既挖掘其背后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又与地方旅游观光融合起来，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意义。

《李光荣下乡记》中的主人公李光荣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小说主要讲述了他下乡扶贫中的所见所闻。李光荣的身上明显带有作家周荣池本人的影子，因此小说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种深刻的互文关系。在扶贫文学创作热潮中，涌现了许多乡村第一书记们所写的文学作品，比如杨一枫的《扶贫笔记》、杨志勇的《追寻初心——我的扶贫札记》、张鑫华的《第一书记驻村日记》、姚高峰的《扶贫手记》等。小说中的李光荣既是一个故事的倾听者，也是一个讲述者，同时还是一个演出者。“他常常想自己到回乡做第一书记以及定点深入生活，不是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到达这里的人群，到达他们的故事，到达他们的内心。这样的到达才是真正的深入，这样的离开才会让到达有意义，而让分别不至于无助与伤感。”乡村第一书记能够深入生活现场，用一种外来者的敏锐眼光观察打量乡村世界，同时他们又与乡民朝夕相处，能够真正体会村民的所思所想，因此他们笔下的描述更能直抵乡村的真相。

文学来源于生活，乡村第一书记的创作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生活情景，作品具有一种鲜活的生活感，每一个文字都带有他们个体的生命体温，具有真实动人的力量与魅力，为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的维度。